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8.05.012

国学大义与个人志业: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缘起新探

周励恒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章太炎晚年创办的一个国学教育机构,也是其一生中规模最大的办学活动。讲习会的创办受多种因素影响,过程也比较复杂。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唤起了章太炎保存国学的使命感,促使他决定再度创办国学讲习会。最初,他与金天翮等人创办的苏州“国学会”合作,开展国学演讲,编辑国学刊物,但因国学旨趣和教育目标的差异而另立章氏国学讲习会;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万元疗疾费,不是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的缘起,但对章氏讲习会的开办确实产生了助推的作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章太炎学术独立个性的产物,与当时国民政府的读经倡导无关。

关键词:章太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国学教育旨趣;办学资金;读经思潮

作者简介:周励恒(1991—)男,北京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8)05-0071-07 **收稿日期:**2017-12-10

既是学术大师又是政治家的章太炎,一生有数次影响较大的国学讲习,分别是1908年至1911年间在日本东京的国学讲习;1913年12月在北京的国学讲习;1922年4月至6月在上海的国学讲习;1934年至1936年在苏州的国学讲习。这几次国学讲习,背景不同,特色亦各异^①。其中,苏州这次是规模最大、最有规划的一次,在章太炎晚年的学术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有关章氏学术的研究,对章氏苏州国学讲习会关注较少,近年虽然引起重视,产生了一些学术成果^②,但对于其创办缘起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其中的史实,由于当事者后来的回忆多有舛误和歧异,让人更加感到扑朔迷离,因此,有专门探析之必要。

一、民族危机与章氏国学讲习使命感之再生

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各种因素汇际的结果。民族危机的加剧,是章太炎的国学讲习使命感再度被激发的首要因素。

1927年是章太炎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前他的学术声望虽然也很高,但他的人生重心是从从事政治。然而自1927年,他基本上退出了政坛,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学术上。1927年之后的数年,他在政治上比较郁闷,在生活上比较清苦。原因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对他在政治上施以高压。护法运动失败后,章太炎与孙中山等人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他赞同和提倡联省自治,无形中与他过去所反对的军阀站在了一边。1925年2月,他和十多个国民党右派人物组织了一个“辛亥同志俱乐部”,批评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对孙中山的批评在孙氏生前还能被容忍,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独裁政权日益形成,对章太炎动辄批评孙中山不再宽宥。1927年6月16日,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以“通缉学阀事呈中央”,第一

^① 参见卞孝宣《章太炎各次国学演讲之比较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

^② 相关研究成果有夏骏《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与近现代国学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田彤《复返先秦:章氏国学讲习会》(《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张凯《文史分合:章氏国学讲习会与国难之际的国学走向》(《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名“著名学阀”就是章太炎。此后章太炎很少有公开的政治活动。1928年11月21日,在招商局轮船公司股东的新闻招待会上,章太炎又对孙中山作了批评,国民党上海市三区党务指导委员会以“图谋危害政府”的罪名,议决通缉。经过两次通缉的威胁,章太炎基本不再发表政治言论了。虽然他“胸有不平”,忿心“遇事发露,仍不能绝”,但在朋友、弟子的劝慰下,他也慢慢学会了隐忍,“研寻理学家治心之术,兼亦习禅”^{[1]712},把精力用在了研究宋明理学及佛学方面。他蛰居上海,以读书打坐消磨时光。

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隐居”的章太炎再也不想容忍了。他打破沉默,开始在公开信中议论时事,表达对蒋介石、张学良不抵抗政策的不满。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的民族危机意识更加沉重。这一时期,他热情讴歌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撰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公墓表》等,支持夫人创办“第十九伤兵医院”,营救伤员。不久,他不顾年老,北上故都,会见张学良、吴佩孚等,敦促张学良抗战,号召全国舆论向政府施压,出兵收复失地。北平的高校和文化界人士给予章太炎很高的礼遇,对他进行了热情的接待。他在北平各高校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讲演,如“代议制改良之说”、“论今日切要之学”、“治国学之根本知识”、“清代学术之系统”、“今学者之弊”、“广论语骈枝”等。这些演讲,有关于政治的,有纯学术性的,也有感怀时事谈学术研究的内容和学风的。在《论今日切要之学》中,他认为,青年学子要用心学习历史,注意体察中国社会的状况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要有救亡图存的自觉意识。“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假使连历史也不清楚,则只觉得眼前混沌万状,人类在那里栖栖皇皇,彼此似无关系,展开地图亦不知何地系我国固有,何地系我国尚存的,何地已被敌人侵占?问他都茫然不知回答的,比比皆是。那末,国家的前途岂不危险吗”^{[2]95-96}?“今当世界在较任何时期为严重的时候,历史上之陈迹即为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其系于一国之兴亡为用尤巨,故史志乃今日切要之学也”^{[2]97}。他对历史学重要性的强调,反映了他的现实关怀。在这次北游南返途中,他经过青岛,又在青岛大学作了讲演,“对‘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意义详加论述,尤对‘耻’字发挥意见颇多,引证亦多”^[3],指出“人能知耻,方能立国,遇难而不思抵抗,即为无耻,因知耻近乎勇,既不知耻,即无勇可言”,明显地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不抵抗政策进行抨击,表达自己的愤懑。

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他多次进行国学讲演,特别重视树立热爱本国文化的意识。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出对于本国文化,要“相与尊重而发扬之,则虽一时不幸而至山河易色,终必有复兴之一日,设国民鄙夷史乘,灭弃本国文化,则真迷失本性,万劫不复矣”^{[2]110}!在章太炎看来,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历史,是“国之特性,不可失坠”的,在外患孔亟的年代,更要着力研究。他还饱含深情地说:“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4]372}历史与国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不重视:“史之有关于国本者至大。秦灭六国,取六国之史悉焚之。朝鲜亡后,日人秘其史籍,不使鲜人寓目。以今日中国情形观之,人不悦学,史传束阁,设天降丧乱,重罹外族入寇之祸,则不待新国教育三十年,汉祖、唐宗,必已无人能知。而百年以后,炎黄胄胄可尽化为异族。然则居今而言复兴文化,舍注意读史外,其道奚由?”^{[2]110-111}“夫人不读经书,则不知自处之道。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2]149}。“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2]150}。“不讲历史,即无以维持其国家”^{[2]152}。章太炎的民族意识非常强烈。他认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民族文化消亡了,就谈不上民族的存在和自立。故每当国势陵夷的时刻,他总是试图从国学中找到民族复兴的种子。辛亥革命时为了宣传排满,章太炎提倡研究“国粹”。20世纪30年代,为了唤起国民的爱国心,抵抗日本侵略,章太炎又一次把眼光放在了他最钟爱也最熟悉的“国学”上。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他忧心忡忡地对弟子说:“仆老,不及见河清,唯有谆诲学人,保国学于一线而已,诚不敢望王仲淹,亦未至献太平策也。”^{[1]898}可见,章太炎传播国学的历史使命感,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再度产生并不断强烈起来。而北平几个月的观感,使他对国学的将来更为忧虑。他对五四运动之后的学风也很不满,这在他以后的讲演中都有强烈的反映。如他说:“夫讲学而入于魔道,不如不讲。昔之讲阴阳五行,今乃有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皆魔道也。必须扫除此种魔道,而后可与言学。”^{[1]153}“近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书为账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5]。在章太炎看来,民族危机如此深重,而学界问题又如此之多,拨乱反正,纠偏救弊,实在是义不容辞、刻不容缓。

二、国学旨趣和教育目标之差异与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另立

学会是章太炎最推崇的文科教育机构。他认为学会可以自由地研究学问而不受官方的监督。他说欧洲

各国“虽然立了学校，高深的智识，总在学校以外，渐渐灌输进去，学校也就带几分学会的性质，方得有好结果”。他把学校比作陂塘，学会比作外面的长江大河，只有经过长江大河的“展转灌输，陂塘才可以永久不涸”^[2]。1932年章太炎北上讲学后感到北平虽“储藏之富，宫墙之美，赫然为中国冠弁”，但其国学教育却“薰莠杂糅，不可讨理”。他当时就萌生了创办学会的想法，但因“事绪未就，复改辙而南，深念扶微业、辅绝学之道，诚莫如学会便”^[6]。此时，恰逢陈衍、金天翻、李根源、张一麈等人在苏州发起讲学，金天翻函请章太炎来苏讲演，这与章太炎办学会以提振国学的想法不谋而合。章氏对苏州素有好感，说“其地盖范文正、顾宁人之所生产也。今虽学不如古，士大夫犹循礼教，愈于伦俗。及夫博学孱守之士，亦往往而见”^[6]。1901年他在苏州的东吴大学任过教，1922年曾有迁居苏州的意愿，苏州对他来说可谓熟悉之地。因此对金天翻的邀请，他欣然接受下来。这在苏州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9月10日，章太炎还与金天翻、李根源等人组织“读经会”^{[7]846}。1933年1月，学会成立，定名为“国学会”，“以讨论儒术为主，取读经会隶之”^[6]。章太炎对“国学会”的讲学非常重视，虽然他住在上海，但两年内不辞辛苦赴苏州讲演“凡二十余次”^[8]。国学会发行会刊《国学商兑》，后改名为《国学论衡》^{[1]915}，章氏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在国学会开办初期，章太炎对会务十分热心，高度重视会刊的编辑工作，特意嘱咐弟子对刊物文章进行磨勘。他在与潘景郑的信中说：“至磨勘《国学商兑》中经学小学文件，愿弟辈切勿辞谢。”“如论龟甲文，直以《周易》出孔、墨后，谓为庄周所作。此等凭虚不根之论，虽今文学家亦不肯道，涂汗楮墨，甚矣！”并叮嘱此后如有关于经学小学的文章，“足下可与戴镜澂（戴于《春秋》亦涉二传之见，然是有师法者）加以磨勘，如有此等议论，必与芟蕪”，如果篇幅不够，“量附辞章诗词可也”。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表达了对刊物文章质量的关切，说：“言有秕稗，非徒损害学会之名，亦且贻误读者”。他认为现在学界的问题，在于“人人畔经蔑古”，如果无人匡救这种弊病，“虽一人独醒，阿胶不能解黄河之浊也”，最后他希望“季海及戴镜澂勉力为之”^{[1]915}。

1934年秋，章太炎一家由上海迁往苏州定居。然而到了这年冬天，章太炎却退出了国学会，另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会址设在章氏寓所锦帆路五十号。在国学讲习会前特加“章氏”，以示与苏州国学会的区别。章太炎在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宣言中说：“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知当世无可为，讲学吴中三年矣！始曰国学会，顷更冠以章氏之号，以地址有异，且所召集与会者，所从来亦不同也。”^[5]章太炎另立门户，反映了他与苏州国学会其他创办者的分歧。章氏的宣言，其实并未触及分歧，只是在谈到地址和召集人的变化时一笔带过。沈延国在谈到其中的原因时说：“自国学会成立，出版《国学商兑季刊》，后又改名《国学论衡》，亦请金天翻主编。以诗人的风格，内容比较多方面采纳。以先生朴学眼光来批判，当然有许多缺点的。但主要是由于宗旨不同，而因此使他们交谊渐渐淡薄，未免可惜。”而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成立，又“使金天翻由‘淡’而‘不欢’了”^{[9]328}。沈延国是章氏国学讲习会的讲师，他与章、金二氏均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他对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另立之原因讲得也比较模糊，但他说的“宗旨不同”，的确指出了分歧的根本。

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金天翻是著名诗人，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1898年与陈去病创办“雪耻学会”，研究新学，并支持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他加入中国教育会，与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吴稚晖等人订交，同年创刊《女界钟》，鼓吹女界革命，此外他还与曾朴合著谴责小说《孽海花》。金氏主要成就在诗文，曾提出“诗界革命”。他的诗文独辟蹊径，内容广阔，表现出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金氏治学注重理解国学典籍中蕴含的情感，“读史书通观世变，文学宏其用，以诗文感世传心史，重内质而轻外美”^[10]。而章太炎则认为，小学、经史等是国学的基本内容；研究国学，应强调其经世致用、保存国性的意义。他说：“今日不患不能著书，而患不能力行，但求力行以成人，不在空言于作圣。”^[11]因此，在国学会会刊《国学论衡》的编辑倾向上，两人就出现了分歧。《国学论衡》后来越发偏重文学，本来用于补白的诗词占据了《国学论衡》的相当的篇幅，经学、小学、史学的内容被严重压缩。这引起了章太炎的极大不快。于是章太炎感到他“与国学会旨趣不合”。章太炎是个性很强的人，旨趣不同也会引起章氏与其他人在一些具体事务处理中的不协调，乃至影响他们之间的个人友情，对此似不必深论。

但章太炎另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应该说还有一个他并不愿说出的原因，那就是教育目标的分歧。章太炎办国学会，还是想延续他过去讲学的传统，培养一流的国学人才。他很早就注意到青年学生国学基础相较于晚清时期有所退化。1914年他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时，写信给长婿龚宝铨感叹道：“近见后生之好学者，亦无几人，远不逮日本留学生。以国人而治国学，其情又不如东人之笃好。”并流露出希望弟子传承和光大自己学问的想法：“季子、逖先四生，亦未知可以光大吾学否耶？”^{[1]587}他晚年居住于上海、苏州，此时是他收徒的又

一个高峰期。但他认为这时期所收的学生大多基础浅薄。他曾在致钱玄同的信中提到“苏州新收弟子约十余人,其中素有根底者凡二三人,余即未逮,幸其志尚坚,皆可与共学者也”^{[1]153}。他念念不忘东京国学讲习会的盛况。《钱玄同日记》1935年5月8日载:“晨接章师五月五日复信,肯写半农碑头。并言今所收学生根底浅薄远不逮昔日东京之盛云。”^{[12]1101}章太炎对于晚年在苏州所收弟子,也寄予厚望,他说戴东原培养出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三位名弟子,自己虽然“岂敢妄希惠、戴”,然而对弟子所寄予的期望,“必不后于若膺等三子也”;又说“若天假吾年,见弟辈大成而死,庶几于心无憾,于前修无负矣”^{[1]916}。正因为章太炎将年轻学者视为传承国学的希望所在,所以开办讲习会,造就学术接班人就成了他的一项重要使命。而苏州国学会的讲学大多是讲座式的,并不成系统,没有完整的人才培养机制,没有固定地址,听讲者不固定,听众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一定基础,“振笔疾书自作记录的颇不乏人”;但也有人听不懂所讲内容,“散出会场时说不及《三国志》《岳传》好听”^{[9]86}。靠这种讲座式的国学讲演很难培养出基础扎实、学有所成的国学人才,而国学会又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没有严谨的讲学计划,只能举办一些面向大众、普及国学基本知识的讲座,有系统的国学训练无法实施,而且从《国学论衡》的编辑风格来看,该会还大有蜕变为一个文学团体的可能^①。这与章太炎办学会的初衷有很大的差距。在培养国学人才方面,他与国学会分道扬镳恐怕是一种必然。

章太炎的锦帆路50号寓所是一座洋楼,“面向朝南,东西两面,均有门出入。外表为一宅,内部系分成两宅。后面迤北尚有一片空地,可以扩大”^{[9]85},能够成为独立办学之场所。这座寓所的购置,为章太炎创办独立学会,实现自己培养国学高端人才的教育目标,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

要之,学术旨趣的差异,教育目标的不同,最终导致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另立。从苏州国学会中独立出来,是章太炎晚年国学教育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里程碑。

三、“万元疗疾费”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加速开办

1935年3月底,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中央委员丁惟汾赠送给章太炎一万元疗疾费。章太炎将此费移作讲习会用。关于“万元疗疾费”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关系,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亲历者的回忆差异很大。概括起来,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章太炎在收到这笔款后为给这笔款找一个合理的用途,于是才开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另一种认为,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设在前,而这笔款加速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招生进度。前一种观点以沈延国、汤炳正为代表,后一种观点以汤国梨、任启圣为代表。

沈延国《记章太炎先生》一书的第九节,在叙述章氏国学讲习会成立的原因时说,章太炎留苏州静养,“政府即送数万金,作养病的费用。先生对于这分‘厚仪’,受呢?不受?与章夫人、门人商量后,以‘取诸政府,还诸大众’的办法,遂决议创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和‘制言半月刊社’”^{[13]87}。汤炳正在记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过程时写道:“丁惟汾与黄季刚到苏州问病,并致疗养费万元,先生力辞不受。门人或劝先生移此款以办学会;先生亦允诺,以为如此则‘庶几人已两适’。这就是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缘起。”^[14]

汤国梨回忆称,丁惟汾来苏前,黄侃曾深夜造访章宅,告知她“日内有人来苏和老师联系,希望届时勿拒人太甚,使人难堪”。两三天后,丁惟汾来访,留下一封信,“内有寥寥数语的信笺一纸,另外有一万元支票”,因丁惟汾在时从未提起过这件事,所以章氏对如何处理这张支票感到“颇为踌躇”。汤国梨认为“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就学者,当时虽仅有五百多人,但讲学会除延聘讲师外,供应就学膳宿以及其他杂费,并不简单。因此所收学费,也比当时一般大专院校为高。而就学者的经济情况不同,也有不少经济困难的”,于是就将这一万元充作讲学会的助学金,“对就学者的一切费用,全都免费”,太炎也认为“这个办法甚好”,遂在苏州、上海等地报刊“登载广告,扩大宣传,为清寒学子解决一些困难”^{[9]87}。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一文说章太炎曾在协和医院治疗鼻疾,“蒋介石闻之赠与现金三万元,先生不受。居正、张继等人乃改用中央党部名义赠之,谓先生为同盟会创始人,与后来改组之国民党有关,此为敬老计,非蒋氏一人之私,左右亦劝先生以此项赠金移作章氏国学讲习会经费”。得款后因经费充裕,讲习会得以营建讲堂,“原拟每人每季收学费二十四元,至此则完全无需收费,已缴者照数退还”^{[9]354}。

以上的说法,彼此之间有歧异,他们中汤国梨是“万元疗疾费”的经手人,而其他三位恐怕并非见证者。沈延国是章太炎的学生,章氏国学讲习会开课后被聘为讲师,并参与讲习会的管理;汤炳正是开课后的研究

^① 《国学论衡》编辑部门最终也意识到杂志的文学内容过多,并自觉加以限制,“及《国学论衡》之文苑诗文一类数量方面应加节谨,与从前办法稍异”(见《国学论衡》第7期,1936年4月30日)。

生,任启圣是开课后讲习会的正式学员。然而即使是经手人,由于事过多年,所作的回忆也难免失实。因此,从当时的第一手资料理清这个史实,是很必要的。

据当事人黄侃的日记,1935年3月28日,丁惟汾(字鼎丞)来找黄侃商议如何将“疗疾费”送给太炎:“言党中以蒞汉师病,赠洋万元,令其致送。与予商赠法,久之,定从予往亲馈,以今日行。旋决以明日行。”^{[15]下册1063}次日“四时后,挈田、祥、慈三子,偕鼎丞(又其一戚)赴苏,九时余到,寓阊门惠中旅馆”^{[15]下册1063}。到苏州后黄侃“即入城视太炎师,乃无病称病耳。出城已深夜”^{[15]下册1063}。当时从南京开往苏州的火车往往夜间九点多钟到站^{[16]625,647},到章宅时间已晚。这天日记所载与汤国梨关于黄侃深夜到访的回忆基本吻合,黄氏很有可能在深夜向章太炎夫妇预告了丁惟汾的来访。然而丁氏来访时间却不是汤国梨回忆的两三天后,而是次日。据《黄侃日记》1935年3月30日条,当日“午与鼎丞入城,以中央党部赠章君一万元发票,手交之。午饭有张仲仁、陈石遗作陪。晡与章君、鼎翁游狮子林。旭初亦至,遂同游怡园而返,宿章家”^{[15]下册1063}。日记显示丁惟汾并没有故意将支票暗中留在章宅,而是当着众人的面郑重其事地赠给太炎,章氏当天兴致颇高,中午设宴款待,请张仲仁、陈衍作陪,下午还与黄侃、丁惟汾同游狮子林^{[15]下册1063},而且第二天还写信对中央党部表示感谢^{[15]下册1063},气氛似乎并不像汤国梨、汤炳正、沈延国、任启圣回忆的那样紧张和尴尬。

当然,章太炎并非心安理得地收下这一万元作为自己的医疗费或用作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很快就做出将此款用于讲学的决定。这从章太炎给王宏先的一封信即可证实。因为该信重要,兹全引如下:“宏先仁弟足下:舍后建筑纠纷,得足下与一峰为之斡旋,近已完全解决。仆前本欲赴南都讲演,而协和、觉生诸公,猝欲以高等顾问相催轂,心有未安,已属印泉婉辞。亦会鼻菌作衄,不能成行。前月杪,丁君鼎丞又来致中央问疾之意,且以医药见惠,此既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亦不复强辞;然无功受赐,终有不安。因去腊已在此间发起讲习会,即以此款移用,庶几人已两适耳。龚君哲甫嘱作一联,已为写好,今属心可带致,即希转交。仆来京日期尚未定,因天时又暴寒也。书此,即问起居多福。章炳麟顿首,二十四年四月五日。”^{[1]804}

这封信的落款可以证明写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丁惟汾送来支票不过几天,故其所反映的有关史实比较准确。该信透露出来的信息还有,国民党政府这一时期确实在笼络章太炎,又是给“高等顾问”的头衔,又是送钱。而且送钱是让最心爱的弟子偕老朋友来送,致使太炎在接受此款方面非常矛盾。大概为这一万元钱,章太炎与汤国梨也讨论过多次,故给她留下“颇为踌躇”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汤国梨对当时情形的回忆是比较准确的。将此款用于学会之用,“庶几人已两适”,说明章太炎还是自觉地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保持一定的距离的,坚持自己一向独立的人格。这封信还证明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确实是在1934年冬季成立的。这些第一手资料说明,沈延国和汤炳正的说法——由“万元疗疾费”导致章氏国学会的开设是不准确的。

不久,章太炎在《申报》发布启事云:“余前因诸生有志国学者推属讲演,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以事体重大,经费不充,未能骤举。顷因小恙,得中央同人馈赠医药费,正堪移用,讲学会开办始有端倪。”此后,讲习活动也随之开始^[17]。章氏计划“先举行星期六之讲演及星期日之读经会,自四月下旬起至暑假时止。地点皆暂就敝寓苏州锦帆路五十号”,正式的讲习会则预备“俟暑假后举行”^[17]。在四月下旬至暑假结束这段时间里,讲习会的讲堂宿舍等设施开始建造。在暑假期间,为满足学子们的求知欲望,章太炎开设了“暑期讲习会”^{[7]858},并欢迎学子向其“执经问难”^{[1]955}。可见,“万元疗疾费”并不是章太炎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的起因,而是有力支持了章氏国学讲习会教学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了章氏国学讲习会的正式开办。

在获得中央党部赠款之后,章氏国学讲习会虽经济上有所宽裕,但因校舍建设投入较大,仍计划收取学费以维持学校运营,只是在收到其他赞助人捐款后才对学费予以减免。《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中最初规定听讲费分三种缴纳:甲、付清半年者二十元;乙、付清一年者三十六元;丙、付清二年者六十四元;宿费每月一元,杂费仆费一元^[18]。开学前又有通告曰:“本会顷承赞助人捐款约二三千,略足供会员四十人听讲费二年。今特设免费听讲额四十名,以尽先执名者充当,额满照章收费。”^[19]这则通告带有广告的特点,即吸引有志于国学者尽快报名。这则通告很清楚地表明,中央党部赠款其实并没有像汤国梨、任启圣回忆的那样被直接用来减免所有学员的“一切费用”或“学费”,减免的是部分报名较早的学员的“听讲费”。减免部分名额的听讲费是因为另有人捐款,与此前的“万元疗疾费”无涉。

四、余论: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与20世纪30年代的读经思潮没有关系

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尊孔读经的号召,一时期兴起了读经的思潮。首先是湖南、广东的地方

实力派对推行传统的经籍教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恢复祭祀孔子的典礼,号召全国尊孔读经。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向受训军官讲“大学之道”。戴季陶也在同年10月强调了读经的重要性,认为“读经,实为急宜注意之问题……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20]。读经号召引起了社会上的热烈讨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很多。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教育杂志》还在1935年5月出版“读经问题专号”,就时下热议的读经问题征集各方意见,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恰在这一时期,章氏在其“星期讲习会”上发表了“论读经有利而无弊”以及针对傅斯年、胡适反对读经言论进行批评的演讲——“再释读经之异议”。

那么,章太炎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强调读经的重要性,是否与这一时期的读经思潮有关呢?或者说是对这一思潮的响应?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所提出的主张是他长期以来坚持的观点,并没有当时读经思潮的时代痕迹。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对儒家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转变。由对孔子的批评,撰写《订孔》,到《检论》时删除该篇,增加一些称赞儒学的篇目即可说明这一点。苏州国学会初期,他发表《“经义”与“治事”》《〈儒行〉要旨》《〈大学〉大义》《〈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等演讲,论述的都是经学对修己治世的价值和意义。《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是此前他经学观点的延续,即论述读经的重要性。为了强调这一点,他用了夸张的修辞方式,开篇就发论:“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也。”接着从三方面层层深入地进行论证:一、论经学之利;二、论读经无顽固之弊;三、论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在谈经学之利时,更是从民族主义角度进行论述:“经学不废,国性不亡,万一不幸,蹈宋明之覆辙,而民心未死,终有祀夏配天之一日。”特别是在民族危难的形势下,读经尤其不可废:“且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在昔异族文化,低于吾华,故其入主中原,渐为吾化,今则封豕长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亡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隶而已矣。”^{[4]141}章太炎的国学使命感本是由民族危机而被激发,他讲国学、办学会,无不是因此而来。该文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论述读经的益处,正是他固有观点的再度强化。

其次,《再释读经之异议》对傅斯年、胡适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他们的经学观而论,与他们批评读经思潮无关。国民党政府倡导读经,掀起读经思潮后,傅斯年、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批判。傅斯年在《大公报》发表《论学校读经》,对主张学校读经进行批评,并用历史事实进行论证。如他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21]372}傅文发表之后,胡适马上在《独立评论》第146号上进行了转载,并写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对其进行声援。胡适说:“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22]391}他的理由就是傅斯年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他奉王国维为近代学问最博而方法最缜密的新经学大师,以王国维所说经学难读的言论作为根据。无论是傅斯年的读经无益论,还是胡适的没有资格读经论,本质上都是反对读经。对傅斯年、胡适的文章,章太炎发表《再释读经之异议》予以批驳。傅斯年、胡适的文章是针对读经思潮而写的,章太炎对他们进行尖锐的批评,从形式逻辑上似乎可以得出章氏是在为读经思潮进行辩护的结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章太炎驳斥的是他们立论的具体观点以及他们反对读经的主张。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在读经思潮甚嚣尘上的三十年代,章太炎对他们文章中的说法也会进行驳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王国维奉为经学大师,用王国维的话说明六经在专门家那里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这对章太炎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傅斯年、胡适举出的事例和抬高王国维在经学上的地位,不仅仅是为了反对当时的读经思潮,也有故意讥讽和激怒章太炎这样的经学大家之嫌。章氏对他们进行反唇相讥是很自然的,与当时的读经思潮没有关系。

第三,章氏开办国学讲习会与读经思潮的目的毫无共同之处。章太炎开办国学讲习会的目的已如上文所论,即培养国学人才,从文化上拯救民族危机。而三十年代国民党倡导的读经活动,意在用经书论证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用经书统一思想以加强其集权统治,通过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因此,尽管两者都主张读经,但目的是不同的。

第四,章氏自觉坚持自己学术主张的独立性,对政府的读经倡议没有予以任何附和。章太炎主张读经的演讲,与他强调读史的演讲一样,都是在学术的范畴内,从未提到政府的倡议。尽管“党内的报纸也盛赞他的读经主张了”^[23],但他从来没有主动附和政府。即使南京国民政府笼络他,以“高等顾问”、“国史馆馆长”相引诱,乃至赠送“万元医疗费”,他都不为所动,依然有意识地与政府保持距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1935年5月进行的读经问题讨论,是对政府倡导的读经思潮的响应,当时一些老学者、经学家如唐文治、姚永朴、

陈朝爵、邓实等都发表了意见,但章太炎没有任何表示,他没有参加与政府倡导读经有关的活动。

上述四点可见,章太炎开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他学术工作独立个性的产物,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倡导的读经活动没有关联。

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4年冬成立,1935年春夏举行“星期讲习会”、“读经会”、“暑期讲习会”。1935年秋正式开班招生。章太炎亲自登台授课,直至1936年6月病重。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继续进行。1937年8月,苏州受到日军威胁,讲习会停办。1938年12月,“太炎文学院”在上海成立,这是章氏国学讲习会在抗战时期的延续,但由于环境恶劣,经费缺乏,最终不得不于1940年6月落下帷幕。章氏国学讲习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也吸引了大批著名学者的参与,培养了众多学术人才。它是民国时期国学教育的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 [1]马勇.章太炎书信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 [2]马勇.章太炎讲演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 [3]章太炎昨抵青岛演讲[N].大公报(天津).1932-05-30.
- [4]张昭军.章太炎讲国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 [5]章太炎.发刊宣言[J].制言,1935(1).
- [6]章太炎.《国学会会刊》宣言[J].国学商兑,1933(1).
- [7]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8]李希泌.章太炎先生的两篇讲演记录[J].兰州大学学报,1980(1).
- [9]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修订本)[M].北京:三联书店,2009.
- [10]张凯.文史分合:章氏国学讲习会与国难之际国学走向[J].浙江社会科学,2016(10).
- [11]章太炎.答欧阳竟无书[J].制言,1936(9).
- [12]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13]沈延国.记章太炎先生[M].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
- [14]汤炳正.忆太炎先生[J].中国文化,1993(8).
- [15]黄侃.黄侃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6]朱希祖.朱希祖日记: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7]章太炎启事[N].申报,1935-04-09.
- [18]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J].制言,1935(1).
- [19]章氏国学讲习会紧要通告[N].申报,1935-09-06.
- [20]罗玉明,陈新征.蒋介石与20世纪30年代的读经运动[J].怀化学院学报,2008(4).
- [21]傅斯年.傅斯年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22]胡适.胡适文存[M].合肥:黄山书社,1996.
- [23]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J].东方杂志,1933,33(1).

The Study of the Source of Zhang Taiyan's Academ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Suzhou

Zhou Lihe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Zhang Taiyan's Academ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Suzhou w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founded by Zhang Taiyan in his old age, which is the biggest education activity in his life. The Academy's founding wa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and experienced a complicated progress. The rising national danger evoked his sense of mission to protect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reason he founded the Academy. Zhang Taiyan cooperated with Suzhou National Culture Association to do the na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at first and then split up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between them. Besides, a sum of money from Kuo Min Tang which was as the gift money given to Zhang had accelerated the opening of the Academy. The establishment of Zhang Taiyan's Academ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Suzhou is because of his character of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had no conne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publicity.

Key words: Zhang Taiyan; Zhang Taiyan's Academ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Suzhou; the view poin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the fund of the Academy;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reading Chinese Classics

[责任编辑 王记录]